

中国文物流失链调查

他用几乎是在颤抖的手,把一块三连扣的玉佩用白色的手纸一圈一圈地缠绕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旧塑料饭盒,然后又打开饭盒,取出这白色的一团,一圈一圈地打开,反复了两次。

他刚到北京没几天,面对我们两个“买主”,居然喊不出价来。沉默了许久,才摩挲着那宝贝开了口,“80万!”玉佩来自山东枣庄的一座汉墓。

他只知道我们是线人介绍过来,一个刚入门,一个懂行,认识不少大买家,我们只知道他以前是建筑工地的工人,这玉佩出土一年多,第一次进京。

玉是真的,但我的同伴在给一位私人收藏馆的馆长打完电话后告诉他:这样吧,现在你的期望值很高,等它降到了30万,如果还没有人买,你再打电话找我。

他交了一下嘴唇,脸上汗珠细密。他的同屋就在楼下的旧货市场摆摊,一边卖一些假古玩,一边联系线人,准备把陌生的客人继续送上来。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北京东南潘家园旧货市场门口人头攒动,有人蹬着三轮车从路口过,车后歪歪斜斜躺着兵马俑。

头两个故事

1990年,作为试点古玩市场的潘家园开张,并很快成为全国文物市场的风向标。

据资深记者吴树调查,潘家园的“古玩”有四种来源,一是散落在民间的文物,由文物贩子走街串巷搜罗而来;二是家传或者是市场上倒腾的旧物;三是盗墓;四是古代有名的老窑址现在仿古做旧生产的工艺品。在两个熟客之间,记者听到如下对话:

“忙吧?”

“明儿就开工了。”

“现在得到五环外了吧?”

“嗨,就在三环!”

“开工”即“开挖”,有报道说,近几十年中国被盗的古墓有20万左右,王侯级墓葬的被盗率超过90%。出土的文物通常以较低的价格流向陕西、甘肃等二级市场,有路子的则直接流向京沪穗等三级市场——同样的文物,在这里的价格要高出二级市场数倍乃至数十倍。

在一位老藏家的印象里,潘家园市场在2003年之前“还有不少精品”,但现在“走一圈看不到几个旧的”。

曾经有国家博物馆的专家在潘家园购得陶罐一只,后被同行认定是不久前在河南被盗的北魏大墓陪葬品,相当珍贵。中国的文博单位极少在地摊上收购文物,这次却迅速展开抢救性收购,国家出手,也惊动了民间收藏家,一时间,潘家园兴起抢购北魏陶俑的热潮。接下来奇怪的事情却发生了:向来看见风涨价的文物市场,此番却波澜不惊,陶俑越卖越多,价格越来越便宜……后来国家停止收购,请警方配合调查,才发现最近涌入北京的陶俑都由洛阳北邙山一村民在土窑里烧出来的。

1980年代末,有关方面对文物的认识曾在“开发利用”与“保护第一”之间摇摆,后虽确立了保护为主的原则,但随着民间文物市场的放开和1994年“中国第一拍”开启的财富神话,藏家开始大量涌现,据中国收藏家协会2006年的统计,中国已有7000万收藏大军。

他们中的很多人会记得当年的“鬼谷子下山”,2005年7月,佳士得公司曾

我国

大量文物流失内幕

调查



《鬼谷子下山》元青花瓷



《历代帝王图》(均为资料图片)

在伦敦拍卖一只产自景德镇的“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鬼谷子是军事家孙子的师父,图罐所绘即是他被请下山,以解燕国被强兵所围之困的故事。这只从数月前就开始巡展,据说全世界仅存7件的元青花,最后拍出了折合2.3亿人民币的天价,刷新了中国文物艺术品的拍卖纪录。

有人估计,“鬼谷子下山”让中国的收藏大军增长了至少3成。吴树记得,当年年底,各路人马云集内蒙古四子王旗,疯抢各种“元青花”,到最后连废品都供不应求,不少人掘地三尺,把荒地翻个底朝天,而在北京的古玩市场,连刚入门的新手,都敢血拼“元青花”,一位教师不惜用一套房子去换取一个元青花小罐。国内的拍卖公司自然相机而动,轮番上拍元青花,仿佛没有元青花,就不叫拍卖会。

出海

如果把文物的流向视作一条河流,那么它的方向自然是市价最高处,不过由于中国的法律禁止倒买倒卖1949年以后新出土的文物,于是文物的流动形成暗河——熟客介绍熟客的关系网。“好东西谁会摆出来卖啊!”潘家园的一位商贩说。一般是几经转手,通过种种办法“洗白”。

“手法非常多,以拍卖公司而言,就可以把出土年代往前推,说是建国前出土,那就算传世文物,可以拍卖了。”国内一家拍卖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物流失发生在清末民初,据统计,这一时期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有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级、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

这一浩劫之后,中国文物又经历三次“流失浪潮”,一次是抗战时期,侵华日军多受过相关的教育,对明、清以上的古董都加以保护,然后再集中起来用轮船运往日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大量日本军官举家移民美国旧金山市,就带去了很多的中国文物。

一次是改革开放前,文物专家潘深亮曾对媒体回忆,“那时,以国家文物商店为经营单位,政策规定乾隆

以前不能出口,可乾隆以后却允许大量出口,嘉庆、道光时期的很多官窑瓷器、书画以极便宜的价格流失海外,甚至,很多真正是明、清时代的真文物,因鉴定失误,被当成仿制品卖了。”

最近的一次,则属1980年以后的走私潮,并由此形成了以港澳为跳板,从内地到欧美的中国文物走私链条。

有人形容,改革开放以后的文物走私,“八十年代开始走,九十年代开始跑”。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上海站站长许勇翔告诉记者,1990年代以后政府部门都经商,出去的集装箱基本免检,所以集装箱走私比较严重,“后来我们在海外发现了大量的佛像、石雕,这些不可能携带的东西,只可能是集装箱运出去的嘛。”

吴树曾经在采访中翻阅海关总署的记录,一般来说海关物品的抽检比例为5%,这么低的抽检率,“有的海关一天居然可以查出上千件走私文物……”

杨焕自小在美国长大,现在他在纽约为国内的一些藏家购买中国古代艺术品。“美国每年3月和9月都有亚洲艺术博览会,我们都开玩笑说这是‘走私汇报展’,”他告诉记者,购买这些走私品的主要还是美国的大古董商,或者是资深藏家,“一件好东西进去了,可能几十年就不会再露面。”

吴树坚持认为,西方炒作中国古董,有其“阴谋”,而在中国崛起的语境下,流失文物也确实最能调动起国人的“两爱”(爱国、爱财)情绪。

官员的无奈

国家文物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开始抱怨文博行业处境的艰难。

“全行业不到7万人,”他对记者说,“全国有40万处不可移动文物,2000万件可移动文物,以全国14个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处来说,财政上地方政府不愿意承担,每年200—300万中央拨款基本上是杯水车薪。”

他举例说,每年文物进出境量是40万件,还有大量仿制品,“这就让工程量翻倍”。由于每张文物许可证都要附照片,还有记录单、出境许可证等等,实际上,“这一点钱连这些基本耗材费都不够。”他苦笑。

“站里缺乏合理的梯队建设,就靠老专家在撑着,有些老同志这么多年了还没有编制……这样下去的后果是什么?一件东西看走了眼,它就出去了啊!”

许勇翔在审核管理处上海站工作的经验是,(文物可能流失的)口子太多了,快件、个人旅客……海关方面缺乏专业人员,文物部门和海关缺乏进一步的合作,“而且,海关岗位经常调动,我们刚跟一位熟了,他就调走了。”

他曾力主建立出入境现场的电视电话系统,但未能如愿——这部分反映了中国文物部门的尴尬地位。

有人形容,改革开放以后的文物走私,“八十年代开始走,九十年代开始跑”……

在海外发现了大量的佛像、石雕,只可能是集装箱出去的嘛”……

“(如提前进行考古保护,)建设单位要出的考古勘测经费大概多少?”记者问。

“整个房地产项目,地下文物保护的钱不会超过一套房子的售价。”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宋大川说。

洛阳之痛

叶鹏是搞文学出身的,洛阳当地的名人,妇孺皆知。

叶先生是站在如今洛阳城最繁华的“东周王城广场”的建筑工程上老泪纵横的,这里四周高楼林立,一派现代化的都市景象。彼时,广场工地上的推土机轰隆作响,尘沙飞扬;就在这简单机械的推土、填土过程中,东周天子陵墓的车马坑从此销匿。几个月后,广场建成。

2002年,洛阳市高层决定在中心城区兴建一个集行政、文化、商业、游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广场,并命名为“河洛文化广场”。谁也没有想到,在前期的考古发掘中,东周“天子驾六”遗存横空出世。这个惊动世界的重大发现,让古城的文物工作者兴奋不已,也让当年的洛阳决策者们头痛不已。

时任洛阳文物考古队一队队长的叶方松清晰地记得,当年出土的“天子驾六”车马坑南北长42.6米,东西宽7.4米,葬车26辆,马68匹,犬7只,人1位,车呈纵向,东西两列摆放。而其中驾马六匹者1辆,驾马四匹者8辆,两匹者15辆。西列车队从北往南,第二辆车的车轳两侧共置六马,排列规整有序,清楚表现出此六马驾一车的关系。洛阳,从此找到了自己作为数百载大周故都的物质载体,不再仅仅依存于史料。

作为广场雕塑评审委员会的主任,叶鹏联合12位专家向洛阳市委写信,请求放弃城市广场的建设初衷,完整保护周王陵系列车马坑。

在人大代表、国家文物局和媒体的干预下,洛阳市做了一定的妥协和退让:保留一部分车马坑,其他全部回填。回填很容易,一周即告完成。“河洛文化广场”即更名为“东周王城广场”,“天子驾六”博物馆坐落在广场地下。

龙门在呻吟

赵川和叶鹏同龄,他画了一辈子的龙门石窟,老人说自己想把石窟都留在纸上,“哪天石窟没了,后代还能从我的画里找到石窟的影子。”

赵川画中的龙门石窟,是洛阳城的宝贝。石窟位于城南13公里处,这里香山和龙门山两山对峙,远观似一座天然的门阙,古称“伊阙”。至隋,炀帝登临洛北邙山,看到伊阙后大喜,随即下令在洛阳建东都,将皇宫大门正对伊阙。从此,“龙门”的名字流传至今。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和北宋,悠悠400年。东西两山现存窟龕2345个、佛塔70余座。龙门山全山造像11万余尊,以卢舍那大佛规模最大。与此同时,山间碑刻林立,是中国最

为盛大的古存碑林,共有碑刻题记2860多块,为魏碑体和唐楷的传世典范。

赵川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要在东山上建一座规模庞大的宾馆,与唐代的香山寺“相映成趣”。

按照地图标识,东山宾馆的位置正处于“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圈”的核心保护圈内。作为特殊地区兴建的现代化设施,龙门石窟管理局当年给国家文物局打报告,称“需改建东山一处康复中心,申报世界遗产时已纳入改建计划,现在宾馆面积已由原来占地6000多平方米缩减到5000多平方米,改建中没有违规扩大面积”。而事实上,东山宾馆的占地面积达500亩,超过“报告数据”几十倍。

龙门石窟是洛阳最大的一件文物。风雨侵蚀,人为盗损和过度开发,已使得这件稀世珍宝不堪重负。1907年和1935年,这里曾经遭受过两场劫难,西方文化强盗和利益驱使下的当地人联手,在龙门大肆开凿,成批量的石窟佛雕从中原输出,流向西欧、美国和日本。如今的龙门石窟,已发现被盗走佛像、菩萨像262尊;毁坏其他雕像1063尊、龕楣8处、说法图浮雕10幅、本生故事浮雕2幅、本行故事浮雕1幅、礼佛供养人浮雕16幅。

这一数字,由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王振国统计了3个月,共调查破坏严重的重点窟龕96个。王振国痛心疾首:10余万尊佛像现在完整的不到1/10,很大一部分被盗卖到国外,除了有64件知道其下落外,绝大多数踪迹难觅。直到现在,龙门的保护还远逊于开发。

盗在北邙

3月9日,白发苍苍的原洛阳古墓博物馆馆长、古墓研究专家余扶危,带着记者走上邙山三十里铺。在前有公路、侧有工厂的一块不起眼的田地间,巨大的土丘岿然屹立,土丘之上枯木遍地、荒草丛生。由于攀丘之人众多,一条小径已绵延其上,直达顶端。当我们行至高处时,余扶危重重地踩了几下脚,带着一种复杂的笑容,撂下话来:咱们踩的,便是汉安帝的皇陵!

三十里铺是邙山的制高点,从这里可以看到众多类似汉安帝陵形状的土丘。东汉刘秀的原陵、汉明帝刘庄的显节陵、汉章帝刘口的敬陵、汉和帝刘肇的慎陵、汉灵帝刘宏的文陵等均在附近分布。

事实上,在邙山厚葬的远非汉代一个王朝。在海拔256米、面积750余平方公里、地跨洛阳所属7个区县的邙山之上,长眠着自东周直到明清历代无数的王侯将相、达官贵人、名流显要,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陵墓群遗址、最大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古墓家数量之多、面积之大、延续时间之长,世界罕见。

“生在苏杭,死葬北邙。”余扶危用这句流传甚广的古语解释“邙山多墓家”的独特人文景象。邙山是中国古代官民向往的终极归宿,大小墓葬总

计数十万,“几无卧牛之地”。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邙山也成为盗墓者的最大乐园。现在考古工作者广泛使用的挖掘工具洛阳铲,最初就为邙山盗墓者所发明。

“邙山之上,十墓九空”是洛阳人对北邙盗墓之盛的形象化描述。在20世纪初,邙山盗墓已呈现出高度的专业化、集团化。其间,大量文物流失海外。建国后至文革结束,盗墓基本得以遏制。但1980年代以来,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邙山盗墓死灰复燃。

河洛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毛阳光博士介绍说,如今的盗墓者大部分都会选择重新进入已被洗劫一空的墓穴,探访上次盗墓后的“遗珠”。盗墓背后有一条复杂而又完整的链条:盗墓者、中介、赞助者、商人,缺一不可。

虽然国家明令禁止,但是邙山盗墓仍“薪火传承”。当地不少农民颇懂盗墓之术,并采用多种方式加以掩盖,如在墓边盖房,从屋内挖地道通向墓室;或修造假坟,暗中掘地盗宝等。资料显示,人为破坏因素已导致邙山墓葬群50年来减少一半,并且仍在继续减少。绝大多数国宝,从邙山流向北京、上海和香港;而文物一旦输入香港,90%都会在极短时间内流向世界各地,从此下落不明。

邙山墓冢惨遭盗空,封土和陵园、古墓遗址大肆被毁,各种工厂、筑路公司、铁路、垃圾场分布其中,甚至有的高速公路穿墓而过,将坟冢一劈为二。洛阳古墓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见过的古墓,四壁盗洞迭出,有不少还是近年来所为。大量古墓及四周被农民逐渐开垦,或改建为烧砖窑。更有甚者,一些大型陵墓被挖成窑洞居住。千年邙山,满目疮痍。

始建于1984年的洛阳古墓博物馆,已更名为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这也是迄今为止,建在邙山数不胜数的墓葬群中唯一的一座博物馆。

馆长王爱文说,由于地势偏远,宣传力度不够,博物馆每年的门票收入微乎其微,完全依靠政府拨款。博物馆的正常运转步履维艰,更不要谈其他。

在药水味浓重的“壁画修复室”里,几名身穿白大褂的技术人员正在修复汉代出土壁画的壁画数量庞大,但由于资金短缺,人才匮乏,这项浩大的工程一直勉强维系。

兴曾几何,废又几多

谈及中国的文物保护,洛阳终究是绕不过去的关键词。这座如今不甚显眼的中原地级市,却跨越了3000年历史。在洛河两岸不到3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夏、商、周、汉魏、隋唐五大都城遗址,13个王朝,105位君王曾于此“问鼎”,形成过“五都贯洛”的恢宏壮烈。

在采访中,无论是官员、学者还是百姓,都无法否认洛阳存在的一个矛盾。这也是中国所有历史文化名城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共同的矛盾:要文物保护,还是要城市发展?现实证明,洛阳选择了后者。

尽管洛阳当局一度以自身“既发展现代城市,又重视文物保护”而自豪,自诩为文物保护的“洛阳模式”;然而2003年,河南科技大学发表一项名为《洛阳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的经验与教训》的研究报告,坚决否定了所谓的“洛阳模式”。

专家认为,洛阳建国以后一开始的规划就是错误的:“将西工大遗址区作为洛阳市中心区来规划,绝大部分地块都规划为工业和城市建设用地,造成了周代王城和隋唐东都城遗址被破坏的沉痛教训,是一个失败的典型。”

(杨潇 陈彦彬 唐跃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